

《特稿》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

——「百年論學」學術對談

主持人：鄭毓瑜（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對談人：顏崑陽（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蔡英俊（清華大學中文系、人文社會系教授）

記錄：吳浩宇（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日期：2008年4月12日

綱目：一、什麼是「現代視域」？

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如何形成？

三、在「現代視域」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哪些值得發展的取向？

四、因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取向，在「方法學」上應該有些什麼適當的原則？假如在方法上必須資藉西方理論，那麼應該如何運用才適當？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

——「百年論學」學術對談

前言

2006年4月1日上午，幾位任教於各大學中文系的古典文學研究同好，發起組成「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讀會」。其設立宗旨在於：集結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究學者，分享學思經驗與成果，以求攻錯之效；開拓多元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俾能寓新意於傳統中；鼓勵學生共同參與、交流，以求拓深其學術視野，並使慧命延續不斷等。初期由政大中文系主辦，在政大「百年樓」舉行，並祈願此團體能夠長期運作，為中文學界提供論學平臺與深遠影響，故省稱為「百年論學」。

現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西方理論與方法的介入下，或出現套用拼貼西方理論的現象，或者陷入失語的窘境與焦慮。所以，重新反思並且形塑新時代的學術內涵，既承續學術傳統與精神，也朗發「存在」的境遇與感受，就成為我們共同的課題與使命。就在「百年論學」兩週年的重要時刻，我們邀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東華大學榮譽教授顏崑陽先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人文社會學系教授蔡英俊先生，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一議題，進行深入對話，並且邀請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毓瑜女士擔任主持人。三位教授在古典文學研究上成果豐碩，深具學術前瞻性與引領性，同時支持「百年論學」發展不遺餘力，所以這是一場具有多層意義的學術對話。當天會議長達三小時三十分鐘，會場座無虛席，甚為成功，唯本篇記錄礙於字數限制，不得不刪去許多細節，故缺漏、跳躍在所難免，懇請與會者、讀者見諒。至於完整的錄音紀錄檔，登載於「百年論學部落格」，網址為：<http://blog.sina.com.tw/inbooks/>。

兩年以來，「百年論學」每月定期召開一次研讀會，未曾間斷。其中，資深學者真誠無私地奉獻寶貴經驗，中生代學者孜孜矻矻地切磋學習，新生代學者積極參與，這讓我們看見台灣中文學界道義相尋的美好景致。如今，謹以此篇文稿，記錄這段可貴的論學歷程。（曾守正撰）

鄭毓瑜教授：

今天是「百年論學」二週年紀念，首先要恭喜政大中文系林啟屏主任、廖棟樑老師、曾守正老師，並且感謝他們對促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貢獻。我認為送給「百年論學」最大的禮物，便是這場對談會。今天邀請到兩位大師：顏崑陽教授與蔡英俊教授。兩位教授對古典文學理論的建構與文學批評的研究，都有非常豐富的貢獻。據我所知，顏教授是百年論學的催生者，蔡教授則是昔日「月涵堂論學」時期的重要主持人，所以今日邀請兩位來對談，是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當然，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亦有繼往開來的意義，我們可以從幾個詞語的演變來觀察，當我們談「作者論」時，很少只談孤立的個體，總會談一個既主觀又客觀的「自我」；當我們談「作品論」時，會被「文本」這個互文性關係體所取代；我們談作者的時代或生平時，可能又會用「空間」、「記憶」、「權力結構」、「物質文化」等議題取代，我們可以從以上詞語的轉換觀察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到了必須開創新視域的時候。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與方法」，這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以下我就把時間交給顏崑陽教授與蔡英俊教授。

■什麼是「現代視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如何形成？

顏崑陽教授（以下簡稱顏）：

主席、各位學界的朋友，今天非常高興，坐在這裡，似乎又找回當年「月涵堂論學」的感覺。

今天，我們所要對談的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問題。近幾年，我對中文學術研究有很深的焦慮感；我所焦慮的是，晚清至今，學術「典範」的遷移並不完全成功，因為學術史積累的知識礦層實在太厚了，學者們普遍抱持著相當保守的心態。許多年來，我所看過的論文，多半是複製性的議題，只在重複前人的問題與答案，能有些小局部的修改，就算不錯了。由新視域所開展的新問題、新答案，並不多見。這就讓我相當憂慮中文學術「現代化」的可能性何在？其次，近幾年我所看過的論文與

研究計畫，大多沒有「方法學」的意識。許多學者並未意識到，現代學術乃是「系統化」的知識，必須在自己所提出的基本假定上，設置一套合理而可操作的方法，以保證論述的有效性。很多論文往往只停留在印象式的閱讀心得報告，主觀而籠統的陳述意見；而非依藉充足、可信的史料，經過精確的分析性詮釋與合法的邏輯推演加以論證。因此，概念不清、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這些缺點都顯示我們不夠重視方法學的訓練，比不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學術研究養成教育。有些中文研究所，雖然也開設「治學方法」；但是這種乾嘉餘緒的舊典範，往往聊備一格而已，實不足以對應現代新的學術問題。何況有些研究所乾脆連「治學方法」這門課也廢除了，真不知他們的研究生究竟「如何」去做研究？寫論文，多是「土法煉鋼」，極不嚴格。這種現象很讓我深感焦慮。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思考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現代視域」？我的論述習慣是先把關鍵詞說明清楚。所謂「視域」是指我們觀看事物所見到的範圍與內容。觀看事物必定繫屬於某一「主體」，即「誰」在觀看？而主體既定，則觀看就必然預設了「立場」，也就是「誰」站在什麼「立場」、從什麼「視角」而以什麼「觀點」在看一個特定的對象。因此，談「視域」一定要顯現出獨特的主體以及確定的立場、視角、觀點。而「觀點」就是指以什麼「答案」去回應什麼「問題」；大體上，一項論述的主要「觀點」都隱含著「一組多個相關性的問題」與「對應的答案」；這也就是在「詮釋」了。因此，所謂「學術視域」就是「問題視域」與「詮釋視域」的組合。

弄清楚「視域」的義涵之後，接著我打算從「時間性」與「知識型」二方面來定義「現代視域」：

一、「時間性」

首先，我要從「時間性」來界定「現代」這個概念。因為「學術史」就是歷程性的時間概念，在座的每一位學者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間位置上存在著，並且進行研究。當你明確覺知到自己是站在 20 世紀晚期到 21 世紀初期，這個「當代」的時間位置上做研究，就應該具有從這一時間位置的存在情境所開顯的新問題視域與新詮釋視域，而不應該去複製近現代以來，甚至古代，前行研究成果在那個領域中所積存的舊問題與舊答案。因此，我對「現代」的這一層定義，是從研究者在學術史的

時間位置自覺來說，還沒有涉及到他的學術視域中是不是滲入了西方理論的成分。

這個「現代視域」的定義，我要強調的是：一位學者站在他的歷史時間位置上，應該要提出前行學者所沒有提過的問題，而相應的給出前行學者所沒有給過的答案。這就涉及到學者對「傳統」與「社群」的認知與態度問題。每個學者都在不斷演變的傳統長流中，在其時間位置上進行研究。身為學者，應該時時自問：我的前面有哪些學者在做研究？我對他們的研究成果能有何所「承」又有何所「變」；而接在我後面又有哪些學者？我對他們又有何所「開」？這就是學者應有的「傳統意識」；從這傳統意識，才能找到自己的「歷史時間位置」。另外，身為學者也應該時時自問：在當代的學術社群中，除了我，還有誰在做同領域或鄰近領域的研究？他們已獲致哪些成果？我如何能與他們對話？如何適當的藉用他們的成果，而又提出他們所沒有提過的問題，並相應給出他們所沒有給過的答案？這就是學者的「社群意識」。從這社群意識，才能找到自己的「社群關係位置」。

假如，一個學者想要打開從「時間性」而來的「現代視域」，我認為至少要有二種內向或外向的行為：第一個是「反思」，對學術傳統的反思。我經常感到困惑的是，許多學者在做研究、寫論文時，從不檢討前行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對學術傳統全無反思。這就很難避免原地踏步，因襲重複了。我認為，學術研究，「反思傳統」是創新的起點。第二個是「交流」，與當代學術社群的相關成員彼此交流。一個學者應該清楚的找到自己在當代的「社群關係位置」。通過交流，才能瞭解同行之間，各自的研究取向與成果。目前學界有各種學會組織或小群的討論會，但是它的「交流」功能還有待加強。當年的「月涵堂論學」與現在的「百年論學」，也就是希望能做到學術社群的交流。

我認為，一個學者只有通過傳統的反思與社群的交流，才能對前人或同行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與創變。接受，以形成研究的知識基礎。在既有的知識基礎上，進而尋找創變的可能：延伸、補充、糾謬、反駁，甚至另闢蹊徑，別開生面。通過「接受」與「創變」的論述，一項研究成果在學術史上的位置與價值，才能得到大家的確認。

我寫論文的習慣，大多先對前行研究成果進行批判，繼而從批判中轉出自己的主題與方法，例如我寫〈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

觀」¹時，先反思、批判從朱自清、郭紹虞、羅根澤、葉朗、顧易生、王運熙、毛毓松、龔鵬程、蔡英俊、陳昌明以來，對儒家「尚用」的文學觀以及詩言志與詩緣情二個傳統的論述，甚至劉若愚對〈詩大序〉文本解讀的誤謬，進而精確的分析、詮釋〈詩大序〉，以「體用相即」的觀點，重構儒系詩學的完整體系。這雖然是老議題；但是，老議題經過反思、批判與重釋，無須借用西方理論，也可以呈現新意。

二、「知識型」

接著，我要從「知識型」(Épistème)來界定「現代」這個概念。「知識型」這個概念是傅柯(M. Foucault)提出來的。他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在某一歷史時期中，人們對何謂「真理」有其基本假定以及一套認識論的規範，就依據這些基準，去判斷知識的是或非。可是，當歷史時期遷移了，前一歷史時期所以為「是」的知識就不一定理所當然的「是」，更可能變成「非」了。也就是歷史遷移到一個社會文化條件很不相同的時期，人們對「真理」的判斷，其基本假定改變了，認識論的規範也改變了，知識的確當性就跟著改變了；因此，知識才有不斷發展的可能，而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有不同的「知識型」。

身為現代人，我們的「知識型」不可能跟清代以前的歷史時期完全一樣。在這個時代，新的「知識型」到底是什麼？學者從事研究，應該要不斷扣問：(一)、我對研究對象的「基本假定」是什麼？跟前代有什麼不同？(二)、新的理論基礎何在？(三)、新的問題以及解答的可能觀點何在？(四)、新的方法學何在？因為新視域所開展出來的新問題，必須有新的方法來解決。

我認為，想要提出新「知識型」的論述，仍然要通過對傳統的反思。在檢討前行研究成果之後，有些學者會依藉西方思潮、理論的啟發或借用，開展出與前代不同的論述，建立新的「知識型」。倘若，有些學者不經由西方理論的啟發或借用，就得從當代、在地的社會文化情境去掘發「原生性」的問題，並想出一套新方法去解決問題。這與學者的「存在感」緊密相連。舉例來說，當代有些學者講「新儒學」；「新儒學」的

¹ 顏崑陽：〈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建構「中國詩用學」三論〉，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2003年4月，收入會議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出版，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頁287-324。

形成，非必依傍西方哲學不可。如果說「新儒學」與「舊儒學」有所差別而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型」，它勢必要對應當代、在地的「原生性」社會文化問題，去思考如何轉化出新的論述。經學當中的「宋學」之有異於「漢學」而為宋代這一歷史時期新的「知識型」，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從《淡江中文學報》第 13 期起，接手總編輯之後，就開設了「人文學新視域」的專欄。這個專欄採開放性質，不是由一個人固定執筆，而是希望對學術研究持有新視域的學者能給稿。在古典文學方面，我們已陸續刊登鄭毓瑜、曾守正、侯雅文三位學者的論文。

鄭毓瑜的〈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²，提示我們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過去在中國哲學裡，一直把心、性（義理之性）當作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本，而成為主流論述。至於形（身體）、氣就比較不受重視。事實上，我們跟外界接觸、交往都是透過「身體」。近現代，西方「身體」的論述很盛行，例如拉岡（J. Lacan）、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傅柯等，他們的理論都被介紹到台灣來。鄭教授應該是受到這些論述的啟發，從身體對自然空間或人文空間的感應，甚至從符號連類的建構，打開一個詮釋古典文化與文學的新視域。這樣的論述已經是新的「知識型」了。

曾守正的〈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³，接續「四庫學」新潮流的開展，做出很具創新的成果。過去《四庫提要》始終被當做靜態的文獻學史料，以供考據之用。晚近「四庫學」的新視域，卻看到《四庫提要》是代表官方立場而很具系統性的文化或文學論述，其中存在著知識與權力連結的問題。曾教授近幾年選擇《四庫提要》的詩文集與詩文評部分，在以往「抒情傳統」論述之外，另從政治、社會、文化的層面，以「知識與權力關係」為主要考察、詮釋觀點，對「四庫學」做了很有創意的貢獻。他的學術視域顯然受到傅柯的論述與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啟發。

² 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淡江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6 年 12 月），頁 257-272。

³ 曾守正，〈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7 年 12 月），頁 325-350。

侯雅文的〈從「社會學」的視域論「文學流派」研究的新方向〉⁴。過去研究文學流派多屬內部研究，從一群人的文學觀、作品風格去討論流派，卻都對文學流派的界定、構成與變遷，缺乏客觀有效的論證。然而一個文學流派之所以會成為文學流派，其構成、變遷與範圍的界定，不僅須要文學觀與作品風格這些內部因素、條件而已，還須要有社會層面的種種外部因素、條件。這一「社會學」的研究進路卻長期被前行研究者所忽略。侯雅文提示我們可以從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社會資源以及文人的互動關係等外部因素、條件，去建立文學流派研究的新視域、新方法。而她對「常州詞派」的研究，也已做出很有創見的成果。

這三位學者所提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寬泛的說，都具有新「知識型」的雛樣。他們對於新「知識型」的開展，也都顯然受到某些西方理論的啟發。

沿著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現代視域」的定義，接著我就可以回答第二個問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如何形成」。簡單來說，一是要有傳統意識與社群意識的覺知：通過對傳統的反思與社群的交流，從中找到自己的歷史時間位置與社群關係位置，因而能提出他人所未發的新問題、新答案。二是面對當代：一個古典文學研究者不能沒有當代的存在感，也不能對當代中西思潮或理論蒙昧無知。學院不應該只是象牙塔，我們必須要有更敏感的觸鬚，以感思當代的社會文化問題，並對中西的思潮與理論，有適度的了解及吸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若能通過以上二個條件，應可開啟新視域，發現新問題、新方法，建立新的知識型。

蔡英俊教授（以下簡稱蔡）：

在 1980 年，我們借用清華月涵堂的一個小房間來談論切磋，在這當中，不只是對問題的摸索，同時也是在找尋彼此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幾年下來，我發現最大的收穫，就是了解朋友們會如何掌握問題，大家對彼此知識性格的理解可說是默然於心。我們常常在講社群，要在同樣

⁴ 侯雅文：〈從「社會學」的視域論「文學流派」研究的新方向〉收錄於《淡江中文學報》第 16 期（2007 年 6 月），頁 261-284。

領域內找一群朋友開啟對話的可能性，對話機制要如何運行，其實是需要經過不斷摸索。

若是從月涵堂時期再往前推，就回到我們今天所談的「現代視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台灣，從外文系開始用「新批評」談古典詩的時候，我們所發現到的問題是：若是我們固守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傳統內，自有一套複製型態的表達形式。然而當我們面對不同的研究方法時，就會開始思考：如何能在自己的研究範圍內找到對應的東西？我們的基本預設是：面對西方學術場域所提示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應？這當中隱含著對峙的觀念，也是我們當年共同的焦慮。

這就牽涉到崑陽剛剛提出的二個基本問題，首先是「反思」。當我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者，我在此時此刻，我要對應何種知識？我的對象何在？研究的方法為何？在這一點上，反思其實是每個人的第一步。反思，對我而言，是我對自己的定位：作為研究者，我比較喜歡大量閱讀不同的方法論，找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對應的可能性，我對於知識的語料會盡量理解，但不會立刻用在論述上。其次，我作為學院內的學者，面對學生、面對同儕，我該怎麼做？與友人交談論學跟教學一直是我很大的樂趣，總希望能將我學到的東西與朋友分享、回饋給學生。

像崑陽提出所謂「知識型」建構問題，作為當代的研究者，要提出前行研究者沒提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該如何呈現？就涉及到「呈現」、「陳述」的問題。回想當初我們在月涵堂談論問題時，往往都是先從觀念的浮現開始。今日許多學術研討會，卻是個人在書齋中應用可蒐集到的知識材料，進而建構出一篇論文，再提交到研討會發表，跟同儕交互切磋。這種方式有一個困境：當我們會前已經構思完整後，雖然經過會議對話，卻也不容易再做大幅度的修訂。相對於當年我們在月涵堂，從一張大綱開始報告，然後慢慢做調整，那種被激發出來的靈感跟發展，其實有著很大差異。近幾年我一直在反省，有這麼多研討會論文要發表，研討會後又馬上刊行論文集，而一些在討論時所形成的火花卻很難被保留下來。我傾向呼籲可以從觀念浮現的階段就開始進行討論，甚至用二個小時以上的時間，針對一個議題進行討論，而非「發表十五分鐘、講評五分鐘、開放討論三分鐘」制式過程。

人文學科的重點應該是經由對話來深化、拓展學術討論的可能性，讓發表者可以充分呈現自己如何思索這個議題，而這是需要時間的累積。一個知識型的建構最終是呈現在論文形式上，論文以問題意識清晰最為重要，要有前後一致的論點。在成諸論文形式之前的推敲工作，是需要同儕更多幫忙、討論的，我所設想的討論機制是希望能讓剛浮現的意念，經由對談將論題開展、深化。人文學科的研究可以呈現「我」的存在，我們應當珍惜主體之間互動的可能性。

針對第二個問題，現代視域的出現，對我而言，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脈絡下，我們如何因應「當代的知識場域」所呈現的議題。這些議題就我們早年來說，會用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來談，現在則是轉化成當代的知識議題。剛剛崑陽在談論問題所引述的內容，也是當前我們可以用到的材料。

顏：

剛剛英俊所說，我們確實應該重新思考「會議論文」是否要寫到如此完整？社群內的討論，應該在構思的階段就提出來，大家自由的對談、激辯。通過討論幫忙你澄清觀念，經由相互問難協助你修正某些假設，討論的功能便在這裡。而學者們真心的投入互動情境中，就會很自然的產生默契、友誼，甚至激發靈感、形成共識而蔚然建立一代學風。如果人文學術社群無法形成這樣的文化，大家都會很淡漠，教完書，各自回到研究室裡埋首研究、找期刊發表，最後只計算論文數量而已。其實我最憂慮的就是這種文化在不斷的萎縮、瓦解，這是我們須要警惕的地方。

依過去的經驗，在學術會議中，彼此的論辯或由前輩學者提出的觀點，對於後進研究生們的啟發，它的功能絕非期刊論文那種靜態的表現方式所可替代。在期刊上，我們聞不到人的呼吸，感覺不到人的體溫、見不到人的胸襟、氣度。唯有在現場的學術交流中，才能活生生的領受到研究人文學問的趣味。因此，在人文研究工作上，雖然我非常注重客觀性的方法學規範，卻也一向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社群交流的功能；獨學無友，無法推動人文研究發展的精神。

蔡：

我先回應崑陽所說的社群功能，如當年在月涵堂，每月一次的小型座談，在小房間內可以聞到各式各樣的味道，談完之後，六品小館的晚餐成為我們永恆的回憶，誰拿了那次的演講費誰就請客。在那段時間裡面有一種從容、悠閒的樂趣。在要求評鑑的今日，那樣的從容是相當難得。談現代視域，除了本身要面對知識語料的問題，還有外在環境的期待與各種要求。回想到 80 年代沒有所謂的評鑑，讓我們可以在月涵堂從容論學，現在則是要求各位在一年的時間內急速地把文章寫出來，這在我看來，不是進步，反而是知識的倒退。

■在「現代視域」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哪些值得發展的取向？

顏：

葉國良教授、張寶三教授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中，發表了一篇〈人文學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成果報告〉⁵，對 2001 年到 2005 年，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案、重要期刊、學術會議主題加以分析。人文學熱門議題，以集部的「文學」領域為最多，又多集中在詩、小說、戲曲；台灣文學則次之，它的興盛應該跟現在的政治因素相關。集部的文學之下，其次是新出土的簡帛，再其次則是明清的文化思想。在「前瞻議題之擬測」的部分，他們認為：(一)、新出土、新發現的材料仍會持續被熱烈的研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域的議題將會持續成為主要的研究取向。

每個學門都一樣，當專業化、學科化發展到比較僵化時，典範出現「封閉」情形，就會有科際整合的需求。我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將來有二個值得發展的取向：一是「關係性的研究」；二是「動態歷程性的研究」。

首先，我說一下「關係性研究」：它相對的是「本位性研究」，也就是將文學從整體社會文化中孤立出來，就本身內部的問題，包括修辭、結構、意象等等，去進行美學性的研究。這種「本位性研究」，上一階

⁵ 葉國良、張寶三，〈人文學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成果報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8 卷第 2 期（2007 年 3 月）。

段是主流，成果豐碩；但是，從下一階段的發展來看，我認為「關係性研究」可能逐漸會成為主流。「關係性研究」是將文學置入總體社會文化情境內，從部件與部件之間的關係去詮釋文學的各種問題，例如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文學與宗教、文學與經濟、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地理等，甚至更多元性的關係，或整體相互滲透的關係，就從各部件之間，彼此互為因素、條件的辯證關係，去詮釋文學的生成、性質、結構、功能、演變、價值等問題。

其次，我要說一下「動態歷程性研究」：過去的古典文學研究，常把研究對象靜態化，沒有思考到它在時間歷程中不斷在演變。因此，大多假定文學有一超越的、絕對的、永恆的本質，而忽略文學有其歷史時間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應當代不同的社會文化因素條件，而不斷的被重新定義，並依循新的定義去創變新文體、新作品。如果學者離開這「動態歷程」的具體情境，以某種藉自現成的「理論」做為判準，做為固定不變的框架，靜態地觀看中國歷代二、三千年的文學，將會造成詮釋上「刻舟求劍」或「仙蒂拉玻璃鞋」的誤謬。舉例來說，假如你對文學本質的界定是取自西方的形式主義，用這個判準就很難瞭解先秦、兩漢文人腦中的「文學」是什麼！而一旦「理論」先行，不從歷史情境去瞭解他們，就會以絕對主觀的立場，貶責孔子不懂詩，只把詩當成教化的工具。這類論述從晚清到五四以來時有所見，因為晚清以來對文學的批評，一方面激烈的反儒家傳統，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如康德（Kant）、席勒（Schiller）、李普斯（Lipps）、克羅齊（Croce）以降的美學影響，簡化的以純粹審美經驗來定義文學的本質；因此一切與政治、社會連結上關係的文學事物，都被貶斥，甚至連理解都不想理解。他們沒有把這些文學事物回歸到當時的歷史情境去理解，也就是他們沒有問：為什麼在先秦、兩漢會產生這樣的文學觀，而進行這樣的文學實踐？這是詮釋性的問題，而不是批判性的問題。你要批判他，也要先理解清楚、詮釋明白之後，才能退一步做某種合理性的後設批判。沒有理解之前就做出預設立場而絕對主觀的批判，就會形成學術暴力。因此，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態度，應該是可以做為大家認真參考的研究取向。

這樣一來，我們必須把文學放在歷史時間性的觀點上，去理解它的「本質」是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期被不斷的重新定義。而所謂「文學是什麼」，其實是一個不斷被重新提問、重新回答的「動態歷程性」問題。

因此「文學是什麼」，並沒有一種離開實際的歷史情境而永恆的、絕對的、唯一的定義。如此，文學研究才比較能鬆動出來，將文本放在歷史的動態歷程中，以當時及傳統的語境去理解，才能發現切實的問題，給出切實的答案。

因此，基於這樣的研究態度與進路，對應於這樣的研究對象，我們內在的思維就必須是「辯證性」的思維，而不能受限於「形式邏輯」的思維。中國人自古以來多用辯證性思維而少用形式邏輯思維去觀看事物、處理問題。形式邏輯的思維必須將具體的事物抽象化、靜態化，才能處理問題；而辯證性思維卻是將事物置入實際存在的狀態中，去看待各種對立的因素之間，如何在動態的時間歷程或結構關係中，進行變化、統合。所以，陰—陽、剛—柔、乾—坤、男—女等等，彼此看似對立，實是相互辯證、生成和合而為一。這種辯證性思維比較相應於中國古人詮釋宇宙、人生諸事物的思維，也比較適合用來處理「關係性研究」與「動態歷程性研究」。所以各位要做好研究，可能對辯證性思維必須多下工夫，解決問題會比較有效。

蔡：

我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將來還有發揮空間的地方，一是語言問題的研究，二是意識形態的研究。

在語言形式的研究部分，我以詩作為例子，中國傳統上是詩和詩人不分，詩是詩人的延伸，我們關注作品時是回到作者身上，會問是在何種條件下寫出詩作。而西方對作品是以公共財概念看待，當詩人、作家出版著作之後，便成為公共財產，不專屬於個人。作品受客觀條件約制的各種條件，便成為研究材料自身的自主性、可能性的依據，因此西方學者研究詩，主要是在研究詩的語言構造經營。中國人並非不談語言的問題，可是我們會傾向先把詩人的問題拉出來，所以當我們研究詩時，其實可以試著從語言本身的解析或是當代西方論述的提供的思考取向來入手，可以試問：古典詩的結構如此精簡，賦、比、興會是如何表現形式？對語言的自覺來講，詩人為何要這樣說？怎麼說？其實還有開展的空間。

宇文所安對中國語言有一有趣的解釋，他認為中國語言使用「舉隅」的思維，用單一的點涵蓋整體，如孔子說看人，要「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或「一葉知秋」，中國人傾向用最精要的部分來代表全體，宇文所安認為這與西方修辭中的借代，是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與語言表現型態。

詩是如此，中國傳統小說以及唐宋以後大量出現的筆記作為敘事文類，這些敘事文字又呈現出何種世界觀？我們要如何去拆解它？其實可以資藉現代知識場域中關於「語言」的理論思考，對傳統論述做更深化的討論。

其次是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先前古典文學研究者都會從作者生平交遊入手，對時代、社會文化背景進行研究。只是當新批評盛行之後，似乎都漸漸忽略、被當成不重要，其實不然，每一文本的闡釋背後有一套社會文化的意念在支撐它，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對典律的反省，如曾守正老師對官方文學論述的反省，就是對官方意識型態的討論。

總結來說，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將來還可努力對文本進行細部拆解，由語言格式的分析入手，以及對意識型態進行拆解。

■ 因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視域取向，在「方法學」上應該有些什麼適當的原則？假如在方法上必須資藉西方理論，那麼應該如何運用才適當？

顏：

我先回應英俊，他提出語言的問題。近現代西方學術，歷經語言學的轉向，不再去論述語言文本之外，邈不可及的東西，例如先驗的形上學問題，處理的是無法被分析、驗證的實體，因此主流性的學術，大多以語言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我常對研究生講，研究古典文學，「文本」有優先性，做研究不要離開文本，隨心臆說；而應該從文本去發現可以深入、延伸去論述的問題。面對文本，假如你只看到表層義，就無法去揭明更深層的問題。例如「一葉知秋」，看來只是一個普通成語，倘若從宇文所安的「舉隅說」去詮釋，我們就要問：為何一葉可以知秋？這樣的陳述，其實隱含著一套中國人的宇宙觀與認知模式。這個宇宙觀與認知模式是，宇宙萬物的

局部與總體都處在生息變化的有機性關係中；而我們的認知，只要掌握到最關鍵的局部，就可以理解到在變化中的總體。從「一葉知秋」的文本結構，就可以看出中國人這個宇宙觀與認知模式，「一葉」只是宇宙萬物衰息的開端，意謂著萬物正從這開端逐漸向全面的衰息進行變化，而同時也可預知「新生」的潛能已隱蓄其中，因此你相對可說「一葉知春」。如果你深入的分析詮釋，的確可以從文本的語言結構去發現更深層的意義。

最後，我來談一談關於「方法學」的問題。現代的學術研究，肯定不同於顧亭林寫《日知錄》、沈德潛寫《說詩啐語》等等。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型；我們必須理解當代所做的學術研究，其「知識型」有何特徵？我認為主要有二個特徵：

- 一、科學性：我在這裡所說的「科學性」，不完全等同於實證的自然科學。我僅從「科學性」來指認現代人文學術在方法學上的一個途徑：論證。具有「科學性」的知識都是可被「論證」，假如只是主觀地發抒了內心很玄祕的感覺，那就不具科學性，無法當學術問題來處理。任何學術問題都要經過論證，才能做出相對客觀性的有效判斷。不過，人文學術的論證不等同於自然科學的實驗證明，它指的是使用充分而可信的史料，經過分析性詮釋與嚴格的邏輯程序，所獲致的判斷。
- 二、系統性：現代學術的另一個特徵就是「系統性」，而且這個系統性必須取得語言的表述形式。「系統性」是指一篇論文內部可能由好幾個概念或範疇所組成。這些概念或範疇在邏輯上必須以可確定的「關係」做為統整原則，以構成一致性與完整性的系統。

我一直在呼籲「系統內批評」的觀念。台灣中文學門的學術審查，許多學者始終不了解「系統內批評」：所有的審查都應該在那篇論文的系統內去進行批評，檢證其系統是否一致與完整；而不能站在它的系統外，從自己主觀的立場一語否定別人的論述。我們要知道一項合格的論述，其實都是在某種基本假定上，運用史料，以及某種方法去證成自己所提出的觀點。因此審查者必須進入它的系統內，指出它史料的誤謬，邏輯上概念的不清楚與推論的缺漏、矛盾。這些客觀性的誤謬，當然可以批判、要求修改。假如是個人基本觀點的差異，不能因為審查者的「假

性權威」，而沒有正當理由地一語否定對方的論述，或強制對方修改。假如這樣做，就是「系統外批評」，系統外批評很容易造成學術暴力。其實，所有系統性知識都是相對的，其確當性只在各自的基本假定與史料、邏輯的運作中，相對得到保證。不能說我的觀點絕對正確，你與我不同的觀點就絕對錯誤。

我們中文學界，目前來看，在研究方法上相當薄弱。我的認知中，完備的方法學體系應該包括：(一)、研究對象的基本假定明確；(二)、主要關鍵性概念的界定明確；(三)、理論基礎引藉適當；(四)、史料的信度和效度檢別明確；(五)、文本意義的詮釋確當；(六)、邏輯推論的程序合法。(七)、一般方法操作正確，例如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分類、比較等，這幾種人文研究經常用到一般方法，如何操作？必須弄清楚。

以下把我自己的研究方法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做研究，已形成自己一套方法學，可分為三個步驟來說明：

一、理解／詮釋：

以中國古代對「法」的概念而言，這是「活法」，是以主體的才性、學養、理解力，在經典文本中涵泳、體悟。一篇論文能否提出創意的觀點，在這個步驟就已決定。第二、第三步驟是屬於論述形式上的方法，只能保證你在表達形式上的清楚與嚴密，而不能保證你在內容上具有創見。因此，「理解／詮釋」是平日深入的閱讀工夫，沒有固定的規矩可循，一旦涉入文本就是在反覆進行理解、詮釋，這也是論題生成的關鍵，卻也只能由個人自得。不過，「論題」的生成，倒有原則性的程序可循。

所謂「論題」指的是學術界「未知」而等待被「論證」的問題。如何生成「論題」？消極性的條件是從學術傳統的反思與社群的交流而來；積極條件是從經典的涵泳體悟而來。而這二者必須雙向循環。你一方面在深度閱讀、理解文本，而獲得意義；另一方面跟著必須將所獲得的意義，帶入學術史去檢視，是否有人已經過論述過，假如無人論及，才是值得你去研究的論題。反之亦然，在學術傳統或社群中爭論未決的問題，也必須帶入經典文本中，尋找解答的可能。如此二方面互相循環，才能生成「非複製性」的論題。

二、分析／論證：

古代學術不太做分析、論證。古人的論述通常都是直觀綜合。現代學術則不能只是直觀綜合；直觀綜合往往僅是陳述籠統的印象式意見。現代學術在綜合之前，一定要經過文本分析性的詮釋，才能達到「論證」的效力。分析、論證這個步驟還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說：

第一階段是「史料信度與效度」的檢別。如何檢別？在這裡，沒有時間詳說。不過，我對近幾年中文研究所教育的觀察，我們研究人才的養成，實在應該加強史料學的訓練。

第二階段則是「分析性詮釋」：論述過程中，徵引文本，一定要加以分析性詮釋。我常看到有些學者寫論文，徵引文本十幾行以上，自己的詮釋卻籠統才三、四行，而且還是文字表層義的複述而已。徵引文本，其整體意義應該先已融會貫通；但在論述過程中，卻必須掌握住最關鍵的詞與句，先對它做好文字表層義的訓解。我認為現代學者做古典文學研究，訓詁學的工夫不能少。假如徵引史料，連文字訓詁義都解不清楚，甚至講錯了，那麼後面延伸性的推論就不可能正確。正確訓解了關鍵詞語的基本義後，在這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分析，深入揭明隱涵其中的深層意義。表層義與深層義其實是相即不離的。這樣做，才能避免藉題發揮、過度詮釋，而犯了論證的大忌。

第三階段是「邏輯化處理」。什麼是「邏輯化處理」？簡單說就是加以概念化、範疇化。「範疇」是比單一概念更高層級的複合概念，也就是事物更大外延的形式存有。概念化、範疇化就是將某種類的事物抽象化，以某些普遍特徵去概括諸多同一種類的個體。假如你的研究不願只停留在對個別事物或現象的描述，而想要建構理論性的意義，那就必須懂得做抽象概念化、範疇化的處理。概念化、範疇化之後，就必須為它「命名」，鑄造一個可以確當地指涉這個概念或範疇的新名詞。

其實，創造性的論述一定要「自鑄偉詞」，像西方的「文化研究」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專業術語出現，因為要指涉一個新發現而又可被界定的概念或範疇時，就須要一個專用的詞彙。接著，概念與概念，或概念與範疇，或範疇與範疇，二者之間加上某種「關係」的連結，就形成判斷或推論。

在這個「分析／論證」的步驟中，理論的依據可視其必要而做適當的引藉。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來詳談。

三、綜合／建構：

這個步驟是針對整個論述的各部分，找到它們的邏輯關係而加以綜合，以建構完整的系統。分析，用以解開整體以詮釋各個部分的概念或範疇；綜合，則是用以連結各部分的概念或範疇成為整體。這二者必須配合使用，分析而不綜合，便會支離零散；未經分析而綜合，便會籠統模糊。

我相信中國古代文學、文化諸事物或現象，其內在應該存在著結構性的關係或發展歷程的規律，只是我們尚未將它揭明而已。當我們深入文本內部，理解了它的結構與規律，便能將它分析、揭明出來而加以綜合，建構整體的系統；我稱這種「建構」為「內造建構」。通過「內造建構」才能生產中國古典文學本身性的理論。中國文學現象本身必然存在著若干可被理論化的因素；只有把它理論化，才能建立可被再應用的「詮釋典範」。否則，寫一篇論文只是解決一個各別的問題，學術價值不大。能建構理論，才可以解釋更多同類的問題。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在這個世紀，應該要能生產原出於本身的理論，轉而應用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上。這是值得大家去努力的方向。假如還做不到，恐怕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就只能一直做個西方理論的消費者。用得好，也不過只是西方理論演繹式的應用；用得不好，則是扞格不入的硬套，學術國際化都是妄想。

至於我對西方理論的資藉態度，既不固求也不排斥，完全視需要而資取。而對它的吸收，也是「識其大體」可也。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孕育它所的文化經驗以及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去了解這一理論原生性的文化經驗與問題，以及理論家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與方法。至於結論性的答案，反而不那麼重要，最好別盲目的照搬過來套用。

對我而言，西方理論的資藉，從不專主一家，往往只做為問題視域、詮釋視域的啟發，或是解決問題取徑、方法的參考。假如直接借用，大多是一些建立在人類比較普遍經驗之上，而外延甚大的基本概念。

至於資藉的原則，可分從下面幾點來說：(一)、相應原則：選擇的理論必須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主題相應。所謂「相應」又可分為：切合

性、包含性、類比性等；(二)、批判原則：所有理論都是提供一種詮釋的框架，有其效用，也有其局限。你要用它，就得先加以批判，而確知它的效用在哪裡、局限在哪裡；(三)、調適原則：針對研究對象與主題，進行理論的修改、調整，使它切實適用於你所做的研究；(四)、統整原則：有些研究，必須使用二種以上的理論，就得考慮彼此的相容性？所有理論都是封閉的系統性知識，有些可相容，有些不可相容。可相容，也得加以統整。統整，首先考慮它們「互補」的效用。一本體系宏大的專書，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不同的問題就需要不同的理論去解決，最好能做到它們彼此「互補」的效用。其次，則是考慮「辯證性」的效用。舉例來說，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一書中，分說了表現、決定、審美等幾種不同的理論，然後拿它們當判準，卻以形式邏輯的思維，去批判〈詩大序〉，而認為〈詩大序〉企圖綜合上述幾種理論，但彼此不能相容而綜合失敗。這是因為他不了解中國人的辯證性思維。假如從辯證性思維去理解〈詩大序〉，則那幾種理論一起出現在文本中，我們並非就不能對它做出辯證融合的詮釋。(五)、可操作原則：資藉理論必須考慮它的可操作性。例如精神分析，就是很難操作的理論。當可操作性低，所謂「理論」的資藉，便只是流於不可論證的假說而已；是否能支撐論述的有效性，很值得懷疑。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很多人誤以為「理論」就等同於「方法」。其實，「理論」不能直接等同於「方法」！理論的資藉只是總體方法學中有時需要(不是必要)的一個環節，供給我們論述的前提性基礎，或看問題、解釋問題的某種框架而已。

蔡：

關於面對理論跟方法的原則問題，崑陽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則是想舉幾個例子來談我們到底該怎麼運用理論。

近幾年看到很多敘述學的論文，我希望可以提供各位一點思考的幫助。像普洛普夫運用結構主義進行俄羅斯童話的整編、分析，最後歸納出所有的童話故事有一些最基本行動與角色配置。如果放到中國傳統故事當中，敘述理論能否提供我們拆解故事的幫助呢？首先，如果「受難」是重要的概念時，我們要問在中國文學的故事脈絡中，「受難」重不重

要？其次，人物的配置，在西方是國王與公主關係，但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我們會發現這未必重要。當我們借用敘述理論的基本單位進行拆解時，兩種文化背後深層的東西，我們能否進入其中？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最常舉的例子是《杜子春》，在《太平廣記》的版本中，最後讓杜子春勘不破的試煉是孩子的哭聲，當芥川龍之介改編《杜子春》時，則將試煉改寫成媽媽的聲音，這一關鍵情節轉移到日本文化時就會以母子結來表現，從中可以看出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所以，在借用理論時，勢必要進行調整，不然只是消費、套用理論而已。倘若我們用敘述理論拆解《太平廣記》，你要如何重新分配行動、檢視角色、配置建構你的基本要素？我們借用敘述理論的目的，不是要證明我們有王子屠龍的模式，而是要看中國傳統故事要說的是什麼？敘述理論可以是我們問題意識的起點，但不是結論。

第二個例子是心理分析，近幾年我有很多學生在做明清之際的遺民研究，我們看到那些遺民對過去如此的迷戀。借心理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找到遺民生活世界的某種解釋，佛洛伊德有兩個基本概念：憂愁與哀傷，當我們眷念、執著在過去，是因為過去一定有一個超大向度的東西超過你自己，所以你不願割捨，必需通過一些儀式（如哭喪、割髮、剃鬚）才能告別，度過巨大的哀傷，繼續走下去。

當然，我們對方法的反省是要很警惕的。理論是幫助我們開啟論點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才要談角度，人不能全知，你永遠只透過在你所在的位置，看到你能看到的對象事物，經過一套操作程序清楚陳述，並且證明我在這個時間點內所做的研究。

最後我會建議在談理論時，把「競逐」和「追新」的心態壓下。我常跟學生講，讀理論要有耐性，盡量不要太快地用在操作文本上，把理論讀熟，視角自然就會出來，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當你回到自己文本時自然可以做一番調整與修補的動作。【責任編校：林淑禎】

